



## 流年碎影

我一度认为,教育就是这样的盐碱地,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探寻草木虫鱼,撞见花开花落,水珠滑动,岁月流逝。

## 盐碱地的守望

□刘亚华

关于我和我的教育,不得不说那片盐碱地。

童年的时候,举家搬迁到一个海边的渔村。那是一片真正的盐碱地,没有淡水,没有能长出庄稼的土地,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荡与长满盐蒿的白色碱地,还有清晨起来后看到门前乱爬的螃蟹,天上成群的大雁,地上散步的野雉,门前鱼塘里与家鸭争食的野鸭,甚至夜里跑进屋子里的刺猬。

小时候的早春清晨,总是会赶着家里那十几头羊,在那片芦苇荡边上的野草地上随意走动,我常常躺在草地上,用一张芦苇叶卷成一个可以吹得响的芦笛,对着天空一吹就是一两个小时。站起身来,那群羊已经跑到离我很远的地方。

我庆幸小时候有过很长一段放纵自己的岁月,我将自己隐匿在芦苇荡里,海滩中,沟渠边,当自己和大雁、刺猬、野雉成为朋友时,天和地就显得很大。童年,我就是和大地万物一起长大的。

除了上学,其他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大地的孩子,往往消失一整天,只在吃饭睡觉时回到家。那个时候上学,是这样上,学校离我家比较远,大概有七八里路。一般八点从家里出发,边走边玩,到学校正常九点多,然后十点多放学回家。一个教室里坐着一、二、三三个年级的学生,父辈们从村子里找了一位识字的老先生,来教我们读书写字。直到上四年级,才有了师范毕业的老师来教我们。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每一个季节的味道都很熟悉:春草青涩而有甜味,总是湿漉漉的没有被太阳晒干一般;夏草葱香,有一种韧性,夹杂着一种纯正的深绿;秋草总有一股烧荒草的味道,却也别有人间气息;冬草少味,却往往草茎油亮干直,抵在嘴里滑滑的。我成为教师或没有任何征兆,但教书二十多年来,一直被童年牵扯着,在最初的几年老是带着学生往田野里跑,往海边跑。我觉得只有在天地间,生命的个体才可以内化成为我的世界。也只有在天地间,人才有自由自在的感觉,放任孩子,也就是放任自己成为孩子中的一个。

后来看到我在渔村教书那几年场景的同行,大都不会忘记那辽阔海边的镜头,那是我和孩子们在大海边野炊、放风筝、做风笛的情景,头上沾满了泥土海草。我一度认为,教育就是这样的盐碱地,我们在这里探寻草木虫鱼,撞见花开花落,水珠滑动,岁月流逝。

记得二十四年前刚教书的那一年,我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生为教育而来!年少轻狂的我,写下这句话是有些狂妄,但亦有着些许抱负。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还有生而为教育而来的念头。

如今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承认:因为那片盐碱地的守望,我成为教育工作者,二十四年来,甘心背负,无私奉献。

## 一路走来

## 我在盐城的日子

□马永青

1996年2月至1997年1月,省委办公厅安排我赴滨海县农村工作,担任省委驻滨海县扶贫工作队坎北乡工作组副组长。作为一名在城市长大的青年,在此之前,很少有接触农村的机会,因此,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想方设法做好扶贫工作。

滨海县是革命老区,新四军当年在这里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滨海人民又为修建苏北灌溉总渠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是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踏上这片土地的,一到坎北乡就迅速走村入户开展调查研究、了解乡情。坎北乡虽然地处滨海城郊,有良好的区位优势,由于多年来投入不足,经济基础、工作基础较为薄弱,道路交通不畅,水利设施不配套,全乡中低产田比例较大,农民文化素质较低,致使村级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可以说是七个省扶贫乡中的难中之难。当时,乡里提出希望建立乡政府楼以及科技文化中心的设想,我认为这不是当前急需的项目,没有纳入计划之中。我和组长蒋继宁同志反复商量,认为还是要抓住增加农民收入这个“牛鼻子”展开扶贫工作,不把是否有标志性工程当作扶贫重点。为此,我们确定了发展城郊型经济的扶贫工作思路,突出了“四倾斜一发展”的扶贫工作重点,即:向乡办骨干企业倾斜、向中低产田改造倾斜、向教育事业倾斜、向基础设施倾斜,大力发展三产和多种经营。在具体安排扶贫工程时,我们既考虑尽可能地“输血”,更注重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既抓现有项目,又抓新的经济增长点;既抓社会事业,又抓农业、多种经营和工业。我们把有助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社会事业,但十分注意量力而行,着重解决急需问题,并尽可能地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起来。比如,中低产田改造到哪里,相关的村级公路就修到哪里,有效地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实施。

现在看来,这个扶贫工作思路和计划是符合坎北实际的。那一年工作组实施了14个项目,总投资591.8万元,其中扶贫资金367万元。在中低产田改造工程上,共投入扶贫资金40万元,完成了西部废黄河沿线贫困带1.36万亩低产田改造配套工程,保证了水稻及时栽插,秋季每亩平均增收粮食300斤,第二年人均增收500元。在多种经营方面,投入60万元(贴息贷款30万元),新建蔬菜大棚300个;投入35万元(贴息贷款20万元),饲养蛋鸡1万只。在扶持乡镇企业上,共投入200万元扶贫贷款,实施化机厂、烟花厂技改,两家企业当年实现利税分别为180万元、120万元。在教育事业方面,共投入39.6万元,帮助全乡6所中小学改建校舍1790平方米,使学生的学习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此外,我们还实施了绿化工程、广播建设工程、希望工程。

积极争取各方支持,着力办好实事,是这一年工作中的另一个重点。在继宁组长的带领下,我们先后赴省委办公厅、省科协、农业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汇报扶贫工作方案,争取后方单位支持。时任省委副秘书长董瑾同志两次来坎北指导扶贫工作,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协调解决中低产田改造配套资金和中

学宿舍楼缺口资金数十万元。当时南京农机化研究所党委书记曹曙明同志率有关处室同志前来坎北解决实际困难。当时为了帮助乡里的化机厂寻求合作伙伴,打开产品销路,我专程去南京市化工总公司,找到了公司纪委书记石宏炳同志,请求他帮助联系相关事项。我还专门去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拜访处长吴可立同志,争取了几十万元的中低产田改造资金。为扩大乡里化机厂的影响,我组织人员撰写文章发表在《江苏通讯》杂志上。

我们通过三千会、现场会等方式,向乡、村干部提出加大工作落实力度、发动千家万户脱贫致富奔小康、加强村党支部建设、培养选拔年轻同志进入村领导班子、重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及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三产和多种经营等建议,乡党委、政府均予以采纳。我们还配合乡党委配齐个别薄弱村的党支部书记。针对多种经营贷款难的情况,我们积极探索解决途径,最终获得贴息贷款,使一些难以启动的多种经营项目得以有效实施。这一做法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增强了党员干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责任心,得到了队部的肯定和支持,省扶贫办简报和《新华日报》先后刊发了我们的做法。在出席中小学校舍落成典礼时,我看到学生们搬进了窗明几净的校舍,精神振奋,学习热情高涨,感到十分欣慰。我们组的同志还参加了乡里组织的篮球比赛,在全乡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继宁组长还组织全组同志赴响水、东台、大丰、盐都、射阳、建湖等县(市、区)调研,使我们对盐城市情有了进一步了解。

由于当时乡里条件有限,没有食堂,工作组一日三餐均靠自己解决,组里四位同志相互协作,分工合作,有的侧重抓扶贫项目实施,有的主要抓后勤保障,工作、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组长蒋继宁同志是省科协所属的《江苏科技报》的社长,他把社里的一辆小面包车用来接送组员往返于滨海、南京之间,组织大家同来同住,互相照应,给组里同志带来了极大方便,邻乡工作组的同志也常常与我们一起同行。这一年其实我们组里每一位同志家里都有具体困难,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但大家都能舍小家、顾大家,一心扑在扶贫事业上。当时有“江苏蒋大为”之称的男高音歌唱家陈文生以及南师大音乐系的师生们赴滨海慰问演出,一曲“说句心里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唱出了思乡之情,让我们很激动,这是与在省城音乐厅里听唱不一样的感觉。

1998年、2007年,我和组里同志一起回坎北看到了乡里的变化,十分欣喜。2019年,为推进全省工人文化宫的整顿、改造和建设,我专程出差去滨海,看到了港口、县城以及成为街道的坎北的重大变化,我对滨海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也为自己曾经在这片热土上挥洒过汗水感到自豪,因为我已经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